

“居然能参与其中”：中国与 1948 年奥运会

许俊拯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 163 号，210023）

指导老师：孙扬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 163 号，210023）

摘要 在筹备参与 1948 年伦敦奥运会的过程中，以王正廷、董守义为代表的中国体育界人士克服了经费、人员等困难，在内部派系争斗与腐败状况严重的状况下，成功组织了一支中国代表团参会。结合国共内战与美苏冷战两大背景，可以推断：王正廷等竭力让中国代表团出现在奥运赛场上的动机，至少有发展体育事业、维护政府声誉、开展公共外交三方面。尽管中国代表团最终一分未得，但中国选手出现在奥运赛场这一事实便已体现出中国继续参与国际事务的决心，王正廷等也有意识地抓住这次机会开展了一些国际交往活动。中国参与 1948 年奥运会堪称一次成功的公共外交尝试，这也显示：或可大胆走出传统体育史的范畴，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体育赛事的价值。

关键词 1948 年奥运会；王正廷；董守义；公共外交

1948 年 8 月 16 日，伦敦奥运会闭幕两天后，《申报》刊登了一条总结性的报道，其中引述了中国代表团总负责人王正廷的看法：“今年世运对我国之真正要义，乃我国经十年苦战后，居然能参与其中。”^①“居然能参与其中”短短七字，却道尽了中国组团参会的不易与坚持参会的动机，也暗示了成功参会的收获。

中国同 1936 年和 1952 年两届奥运会的关系，因其中包含的鲜明政治色彩，受到了不少历史学者的关注。^②相比之下，被夹在二者之间的 1948 年于伦敦举办的第 14 届奥运会就显得有些“无人问津”。国外暂未见“中国与 1948 年奥运会”相关主题的论著，国内也鲜有专门研究，已有研究大多只是附带谈及中国与 1948 年奥运会的关系。^③而本就数量极少的先行相关研究又大多失之粗略，在研究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上均留有遗憾，且参考资料较多使用

^① 《世运圆满闭幕 收获成就丰满 我选手团已尽力奋斗》，《申报》1948 年 8 月 16 日，第 7 版。

^② 中国派出了民国时期三届奥运会中最大规模的代表团参加 1936 年柏林奥运会，以图增进中德关系、并通过国技武术展示中国形象，而 1952 年赫尔辛基奥运会牵涉到北京与台湾谁能代表中国的问题。相关研究如罗时铭：《试论近代中国民族传统体育与奥林匹克文化的抗争与融合》，《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6 年第 3 期，第 1-5 页；郑光路：《中华武术在 1936 年柏林奥运会》，《文史精华》2008 年第 6 期，第 59-64 页；史慧佳：《交流与展示：中国参加 1936 年柏林奥运会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3 年；Xu Guoqi, “China’s National Representation and Two-China Question in the Olympic Movemen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1952 Helsinki Games,” *China Perspectives*, No. 1 (73) (2008), pp.19-28.

^③ 如完颜绍元：《王正廷传》，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23-327 页；徐国琦：《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崔肇钰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54-55 页。

二手史料,研究视角也多局限于传统的体育史。^①

事实上,奥运会这样的国际性体育赛事是不可多得国际交往舞台,奥林匹克的历史是一部体育史的同时,也是政治史与外交史。尽管现代奥林匹克精神鲜明地拒斥政治的干预,可 1936 年柏林奥运会等例子已充分展现奥运会同政治无法完成泾渭分明的切割,东道主、参赛国,都可能抱着各式各样的文化、内政、外交目的参与奥运会。

1948 年奥运会作为民国时期中国参与的最后一届奥运会和冷战阴云下的第一届奥运会,其对于中国的意义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意在综合运用前人未能充分利用的相关个人的回忆及传记资料、当时的中外媒体报道,在注意到国共内战与美苏冷战双重背景的同时,结合体育史与政治外交史的多重视角,以求在前人基础上更好地完成以下尝试:第一,尽可能完整、客观地还原中国参与 1948 年奥运会的过程及过程中体育界的内部争斗;第二,尽可能全面地考察中国在如此艰难的国势中坚持参会的动机;第三,探究中国参与 1948 年奥运会,在竞技与外交两个维度分别有什么收获,并进一步分析中国的参会是否能被视作一次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尝试,以及这样跳出传统体育史的思路有何意义。

一、参会过程之“明线”:经费、人员问题的应对

在筹备 1948 年奥运会的过程中,“实际领导全国体育”并“发号施令”的,是 1931 年被国际奥委会承认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②

1947 年 1 月 7 日,全国体协召开常务理事会商讨筹备事宜,“筹备工作包括两方面:一是人,一是钱。首先是运动员的选拔和代表团的组织,而能出多少人又决定于有多少钱。”^③然而自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财政便始终处于崩溃边缘,更兼内战愈演愈烈,美国又在马歇尔调停失败后暂停援助,全国经济状况由此雪上加霜。因此,在中国筹备 1948 年奥运会的过程中,“最感缺乏的”恰恰正是最重要的经费与人才。^④

1 月 7 日的常务理事会无力解决经费问题,只是成立了以中国体育界元老、第一位中国籍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为首的 7 人组织遴选委员会,以选拔参会人才。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全国体协召开了三次比较重要的会议,以解决面临的经费和人员问题。

第一次会议是“为准备遴选选手”而举办的遴选委员会第一次委员会议,它于 1947 年 5 月 1 日在上海召开。^⑤会议决定,以“第七届全国运动会为初选,并分别组织篮球,足球及田径游泳三项遴选委员会”^⑥。然而,因为内战局势紧张等原因,原定为 1947 年“双十

^① 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金玉良:《第 14 届奥运会与中国代表团》,《体育文史》1994 年第 1 期,第 45-47 页;裘争平:《1948 年伦敦奥运会上的中国足球队》,《档案春秋》2006 年第 10 期,第 41-43 页;李博:《张伯苓与 1948 年奥运会》,《兰台世界》2014 年第 13 期,第 88-89 页。

^② 东南日报体育版编:《伦敦世运前夕》,上海:东南日报社,1948 年,第 38 页。

^③ 董守义:《奥林匹克与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编:《奥运会与中国》,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年,第 28 页。

^④ 章辑五:《中国体育的命运》,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编:《中国近代体育文选——体育史料 第 17 辑》,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 年,第 482 页。

^⑤ 东南日报体育版编:《伦敦世运前夕》,第 11 页。

^⑥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干事部编:《第十四届世界运动会中华代表团手册》,南京:中华全国体育协进

节”献礼的全运会被迫推迟。尽管教育部体育督学郝更生很快便表示“我国参加明年世运会之计划，决不应全运会之延期而受影响”^①，但无疑“选拔运动员的事不得不搁置起来”^②。

第二次重要的会议是1947年11月2日于南京召开的全国体协全体监事联席会议，会议“重行修订各项代表团选拔办法”^③，确定了代表团的组织，推荐王正廷为总领队，董守义为总干事。^④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方面难以指望，筹集经费“大成问题”，联席会议还决定组织“中国参加第十四届世界运动会经费筹募委员会”，委员包括王正廷、孔祥熙、吴铁城（国民党）、朱家骅（教育部）、谷正纲（社会部）、吴国桢（上海市）、胡文虎（华侨）。^⑤这七人中的身份，已经暗示了经费筹委会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间，从官僚资本巨头到华侨慈善巨贾的全面的筹款方向。这种近似“四面出击”的筹款方式，也反衬出经费问题的严重和代表团组织者的窘迫。

第三次重要的会议于1948年2月18日召开，当天的若干分会中规模较大的是晚8时举行的全国体协常务理事会，但真正重要的则是下午4时召开的经费筹委会首次会议。^⑥此次会议定下了三大募款方向：（一）由教育部、社会部向行政院呈请准予补助之半数；（二）向国内热心体育人士劝募，尤以上海、广州等城市为主要对象；（三）向海外热心体育侨胞劝募。另外，会议还期盼能在4月底前将经费收齐。^⑦

不过，经费筹委会定下的总预算究竟是多少，行政院最终划拨了多少，各方记载并不统一。《伦敦世运前夕》记载：会议确定：“所需经费以美金十二万元计”，其中向行政院呈请的金额“计美金六万元”^⑧。董守义的回忆则是：预算总额为“美金十五万元，由政府、社会人士、华侨三方面各筹五万元”，行政院“到5月10日才批准了半数……折合美金二万五千元。”^⑨《第十四届世界运动会中华代表团手册》也写道：“政府仅补助二万五千美元折发英镑”^⑩，这仿佛印证了25000美金这一数字的准确性。但是，1948年5月11日行政院第55次会议议事日程却记录了外汇审查委员会关于这笔款项递交给行政院的意见：“目前外汇极度缺绌，或应酌派少数人员，作观摩性质之参加，并由政府补助美金一万元折发英镑，此外不便再予结购。”^⑪该日议事日程中，关于这条讨论事项的“决议”部分是空白，因此难以借此断定行政院最后到底拨发了多少外汇，笔者因能力所限，也暂未找到行政院的最终裁

会干事部，1948年，第6页。

^① 《我国参加世运 不受全运延期影响》，《申报》1947年6月11日，第5版。

^② 董守义：《奥林匹克与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编：《奥运会与中国》，第29页。

^③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干事部编：《第十四届世界运动会中华代表团手册》，第6页。

^④ 董守义：《奥林匹克与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编：《奥运会与中国》，第29页。

^⑤ 参见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干事部编：《第十四届世界运动会中华代表团手册》，第7页；董守义：《奥林匹克与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编：《奥运会与中国》，第29页。

^⑥ 会议时间地点参见东南日报体育版编：《伦敦世运前夕》，第20、21页，《东南日报》体育版保存了当时的会议记录，在时间地点的记载上应不会出错，而董守义在《奥林匹克与中国》一文中的回忆也可佐证开会日期为2月18日，《第十四届世界运动会中华代表团手册》第7页中将日期记为2月17日，应为讹误。

^⑦ 东南日报体育版编：《伦敦世运前夕》，第21页。

^⑧ 东南日报体育版编：《伦敦世运前夕》，第21页。

^⑨ 董守义：《奥林匹克与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编：《奥运会与中国》，第29页。

^⑩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干事部编：《第十四届世界运动会中华代表团手册》，第7页。

^⑪ 《行政院会议议事日程（第五十五次）》，1948年5月11日，行政院档案，数位典藏号014-000205-00021-003，台北“国史馆”藏。

定。但当事人董守义的说法和 1948 年 6 月发放给中国代表团成员的手册所记载均为 25000 美元,《申报》也有记载称教育部拨款为 25000 元,^①因而似应暂以这一数字为准。此外,且不论这笔拨款具体金额几何,据董守义自称,6 月 22 日代表团才领到这笔款子,而那时他已为之“奔走各衙门共四十一,南京和上海之间跑了二十五次。”^②

至于社会人士捐款方面,经过多层的关系疏通与介绍,商人钟玉亭以被聘为代表团顾问为条件,捐助法币 20 亿元,钟又介绍顾乾麟、顾家珍、王统元三人各捐法币 20 亿元,三人的条件是以代表团随员名义随团出国。^③而在华侨方面,在与王正廷讨价还价一番后,胡文虎才同意垫付足球队出国时的费用,胡的儿子胡好还借机当上了代表团顾问。^④

经费难以募集,与经费息息相关的运动员选拔自然也难以开展。何况全运会也因为内战原因推迟到了 1948 年 5 月才开赛,整个竞赛的过程更是腐败横行、乱象丛生,根本无法收到选拔之效。^⑤因此,曾经一些热心体育人士理想中“有很多的人员,整齐的阵容”^⑥的代表团,最终仅由足球、篮球、田径、游泳、自行车少数几个项目的运动员组成,运动员总数只有 33 人,^⑦而代表团职员却有二三十人,且大多都是商人,体育相关人士仅七八人。^⑧

代表团规模不大,却分三批出国,这其实也是缺少经费所造成的无奈之举。足球队自 4 月底便经印度各埠,通过商业比赛筹集经费,顺道赴英。篮球队 6 月底由沪飞菲,再换机转香港,经新加坡各地赴英,途中比赛不少,既是热身赛,也是筹款赛。代表团职员和剩余选手则在 7 月上旬出发,经美赴英。^⑨

二、参会过程之“暗线”:体育界的内斗与腐败

除了为经费与人员问题焦头烂额,当时的中国体育界内部也绝非铁板一块,而是暗藏不少矛盾,这些矛盾造成了一些风波,干扰了本就困难重重的筹备进程。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体育界主要有两大机构,分别是教育部下设的国民体育委员会以及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前者是政府部门,后者是民间团体性质的全国体育运动领导组织。实际上,二者之间也并无特别明确的界线,存在一人在两个机构中分别挂有职务的现象。

两机构中,根基较深且有能力、有资格承担起筹备参加 1948 年奥运会事宜的是全国体

^① 参见《世运代表团措施失当 京体育界有控诉 上书朱教部长要求彻查》,《申报》1948 年 6 月 16 日,第 6 版,其中南京体育界人士攻击中国代表团的理由中,有“代表团经费教部已补助美金二万五千元”的说法。

^② 董守义:《奥林匹克与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编:《奥运会与中国》,第 30 页。

^③ 董守义:《奥林匹克与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编:《奥运会与中国》,第 30 页。

^④ 董守义:《奥林匹克与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编:《奥运会与中国》,第 31 页。

^⑤ 有关第 7 届全运会之乱象,参见赵善性整理:《旧中国一至七届全国运动会介绍》,体育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编:《体育史料》第 1 辑,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0 年,第 29 页;邓效良:《横行霸道、笑话连篇的比赛——一九四八年旧中国“七届全运会”回忆片段》,体育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编:《体育史料》第 1 辑,第 34-35 页。

^⑥ 吴邦伟:《谈参加世运》,《申报》1947 年 3 月 13 日,第 5 版。

^⑦ 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体育史学会编:《中国近代体育史》,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9 年,第 263 页。

^⑧ 《世运代表团措施失当 京体育界有控诉 上书朱教部长要求彻查》,《申报》1948 年 6 月 16 日,第 6 版。

^⑨ 《世运代表团分三批出发》,《申报》1948 年 6 月 9 日,第 6 版。

协。^①然而国民体育委员也从未停止尝试染指全国体协的“固有地盘”。先后控制教育部的CC系与朱家骅派均企图控制体育事业，但体协的传统领导王正廷、张伯苓等人也非易与之辈，轻易不许外人插足体育界。^②

抗战胜利后，老体协势力与教育部官方势力之间的派系争斗仍在继续。充当教育部“走卒”的是体育督学郝更生，而全国体协的代表人物则是王正廷和董守义。1945年，在王正廷、张伯苓等体协元老的暗中帮助下，董守义成为中国第三位国际奥委会委员，这引起了郝更生的不满，也为1948年奥运会的筹备过程埋下了隐患。^③

1947年7月18日，郝更生突然指控参加国际奥委会会议的董守义擅自“要求一九五六年之世运会在我国北平举行”，还故意泄露出一封写给董守义的信函，以替董谋划遮掩之名，行对董抹黑攻击之实，函中写道：

此次足下赴欧出席世运会筹备会议……之决定，完全出诸个人间之私相授受，并无理事会决议之根据，滑稽可笑，莫此为甚，倘令国人闻知，此种内情，不但体协理事会同人，将受人指责，即老兄个人，亦必为国人所鄙弃……^④

董守义对于这封“一连造了三个谣”^⑤的信函怒不可遏，又是发声明，又是开招待会，^⑥但这无法全部挽回谣言造成的损失，也只能加剧教育部同老体协之间愈发严重的对立。不过需要说明的是，郝更生造谣诽谤的下策并不意味着全国体协的“白璧无瑕”，也不能抹杀两个阵营都为民国体育的发展做出贡献的事实。

在1948年奥运会筹备过程中，让王正廷为首的代表团遭受最大批判的，是赶赴英国前夕的两场风波。首先是代表团拒绝乘坐中国航空公司飞机事件。此事源于中国航空公司了解到中国代表团经美赴英的行程后，“为提倡体育”而“特别予以优待”^⑦，在当时外汇奇缺的情况下，中航予以的各项优惠措施可节省共约9000美元的外汇。然而，代表团拒绝了中航公司的提议，中航方面自然对这种“舍弃可以节省外汇之本国飞机，而转就美国飞机”的行为感到失望与愤怒。^⑧王正廷对此解释如下：

^① 参见东南日报体育版编：《伦敦世运前夕》，第38、39页。

^② 参见董守义：《奥林匹克与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编：《奥运会与中国》，第18-21页。

^③ 董守义当选委员的具体过程，参见董守义：《奥林匹克与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编：《奥运会与中国》，第18页。

^④ 《董守义赴欧经过 郝更生吴蕴瑞提出报告》，《申报》1947年7月18日，第5版。

^⑤ 华晨栖：《旧中国申办奥运会的一场风波》，《体育文史》1992年第3期，第67页。三个谣言分别是“1、董守义到瑞典并不是参加奥运会筹备会，而是出席国际奥委会会议；2、董守义是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而不是代表体协去开会；3、董守义是在1947年接到国际奥委会会议通知后，和张伯苓反复商量后，考虑到国际奥委会另两位中国委员孔祥熙、王正廷都无暇与会，因而决定前去开会的。”因具体造谣内容与正文中心思想联系不大，故不在正文中加以引用。

^⑥ 参见《董守义发表谈话 否认要求世运会举行》，《申报》1947年7月19日，第5版；华晨栖：《旧中国申办奥运会的一场风波》，第68页。

^⑦ 《中航公司优待世运代表团》，《申报》1948年6月8日，第6版。

^⑧ 《世运代表团经美赴英 乘坐美机出国 中航力争不获》，《申报》1948年6月11日，第6版。

因西北航空公司有环球联运之服务,中航公司则仅能自沪飞至旧金山,自旧金山至伦敦一段仍须换乘外国飞机,故决定乘西北公司机出国,且西北公司接洽在先,位置已定妥,不能取消。至于中国选手乘中国飞机一点,王氏认为无庸考虑,渠称除非中国能自造飞机,否则仍不够彻底也。^①

王氏的解释显然难以服众。6月16日,南京体育界42名代表“对本届我国世运代表团各项措施,表示不满,上书教育部长朱家骅要求彻查,扣发护照,严加审核。”^②上书中列数王正廷为首的代表团三大“罪状”: (一)巧立名目、安插私人; (二)蒙蔽政府、营私勾结; (三)擅募经费、搭乘外机,并要求总干事董守义公开答复。^③董守义回应了体育界的质疑,重申了代表团人事安排的正当性,但马上又遭到了吴蕴瑞的揭发。吴氏指控董守义借“顾问”名义,未经全国体协通过而向教育部申领护照。^④暂不论吴蕴瑞指控的真假,值得注意的是,吴氏正是约一年前和郝更生共同在《申报》上以一封“公开的私函”诽谤董守义擅自申办1956年奥运会的人。

42人上书的第二天,《申报》又刊载了顾其行逐条批驳王正廷6月11日声明的文章,并讽刺王正廷的解释是“存心拒绝一件事情,随便举一个理由”。^⑤当时号称“全国体育新闻第一”的《东南日报》体育版主编陈桑榆(笔名桑榆,姓陈)此时也同王正廷“展开笔墨大战”,据陈氏揭露:代表团选坐美国飞机的真正原因是“总领队可以赚五百元美金的回佣”^⑥。

与此同时,又有对代表团不利的消息传出:与代表团相关的两位长跑运动员王正林和楼文敖在5月赴美求见孔祥熙,并从孔处求得了一笔捐款,孔祥熙本人后来也确认了此事,但代表团方面声称“从未派人赴美向孔博士捐款”。^⑦于是这笔捐款的去向又成为了一个谜,一些“熟悉体育界内幕的人”指控王正廷、董守义派出了王、楼二运动员,并伙同他们贪污了孔祥熙的捐款。^⑧

由于当时的国统区“贪污舞弊已司空见惯,比这更严重的案子多得很”,代表团的这两场风波不久便就“被忽视了”^⑨,代表团的官方立场始终是6月26日声明的“购买飞机票因有回佣……实与事实不符”和“本团从未派人赴美向孔博士捐款,对于此事现正彻查中”^⑩。

半个多月后,事情的内幕似乎才逐渐清晰,原来,与王正林、楼文敖同赴美国的还有一

^① 《世运代表团经美赴英 乘坐美机出国 中航力争不获》,《申报》1948年6月11日,第6版。

^② 《世运代表团措施失当 京体育界有控诉 上书朱教部长要求彻查》,《申报》1948年6月16日,第6版。

^③ 《世运代表团措施失当 京体育界有控诉 上书朱教部长要求彻查》,《申报》1948年6月16日,第6版。

^④ 徐纲:《世运代表团的贪污舞弊案》,《群言》1948年第2期,第8页。

^⑤ 顾其行:《拒乘中航飞机出国 闢世运代表团声明》,《申报》1948年6月17日,第6版。

^⑥ 胡传斌:《世运团出国前闹趣剧》,《平民日报》1948年7月14日,第2版。

^⑦ 子文:《世运代表团声明 未向孔祥熙募捐》,《华北日报》1948年6月27日,第5版。

^⑧ 徐纲:《世运代表团的贪污舞弊案》,《群言》1948年第2期,第7页。

^⑨ 徐纲:《世运代表团的贪污舞弊案》,《群言》1948年第2期,第8页。

^⑩ 子文:《世运代表团声明 未向孔祥熙募捐》,《华北日报》1948年6月27日,第5版。

人，便是与王正廷笔战的陈桑榆。楼文敖是个哑巴，他在美活动全由王正林、陈桑榆控制，而孔氏的捐款很可能“无形中落入陈王的腰包”。陈桑榆没想到的是孔祥熙向代表团发询问款项是否收到，“为了遮盖狐狸尾巴”，陈氏便向代表团要求准许自己进入随员名单，并承认尚未正式报名参赛的王正林为正式团员，这样一来，给陈王二人的钱也就顺理成章变为了给代表团的钱。无奈陈氏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他的要求被王正廷回绝，对此又惧又恨的他索性“和世运团捣一下蛋”。而陈桑榆恰巧知道代表团选坐美国飞机的内幕，遂先发制人。^①若这份报道属实，则可基本确定，王正廷等主要因个人回扣原因，放弃了可以节省外汇的中国航空公司，而选择乘坐美机。但被贪污的孔祥熙的捐款，则是王正林、陈桑榆合伙所为。

从郝、董的奥运委员纠葛，到因回扣拒坐中航飞机事件，再到贪墨孔祥熙捐款事件，抗战后中国体育界之黑暗可见一斑。这里面既有官方派与老体协派之间的倾轧，也包含诸多程序不正当的腐败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也许有经费不足等无奈的因素，但大多也褪不去假公济私的色彩。且从客观来说，毕竟这些行为都违反了有关规定甚至法律，只是当时类似的、更腐败的人物、领域和事件太多，所以体育界的混乱便被长期淹没在历史中了。

三、内战、冷战双重阴云下的参会动机

有经费、人员之外患，有派系争斗之内忧，王正廷等却终究将其克服，^②总算使中国代表团成功出现在1948年奥运会的赛场。筹备与会的过程越是艰窘，越能表明：王正廷等在国民党政权大厦将倾之时尚如此重视对奥运会的参与，恐怕不仅仅出于对体育事业的热心。若欲全面考查王正廷等的参会动因，需要超越中国体育史这一相对局限的范围，从国共内战和美苏冷战的双重大背景中加以思考。

首先需明确国共之争背景下体育事业的位置。抗战虽然胜利，但国民政府接手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除此之外，还要应对貌合神离的滇桂等地实力派。国民党政权的掌控力远不能覆盖至全国，却要承担一个统一政府的国内、国际义务。在这种情况下，体育事业自然居于一个较为次要的位置，但无论出于粉饰太平的宣传效果和还是强健国民体格的实际需要，体育事业又都不好被随意放弃。而这一时期的体育事业归根结底也是要为国民政府“建国”的总目标而服务的。

因为体育的次要性，所以只有当国共之争于国民党一方有利时，党内最高层才会对体育事业较为慷慨。1946年秋末冬初，国民党方面攻占张家口，召开“制宪国大”，蒋介石志得意满，遂“对组团去国外扬威很有兴趣”，他对王正廷说：“你们只管选拔运动员，经费的问题好商量。”^③据称中国决定参加1948年奥运会也正是奉了“上谕”：“实得蒋主席去年（19

^① 陈桑榆涉及贪污孔祥熙捐款的内幕，参见胡传斌：《世运团出国前闹趣剧》，《平民日报》1948年7月14日，第2版。

^② 《王正廷传》将上述若干风波均称作“谣言”，并称赞“王正廷不甘功亏一篑，‘拼得最后一趟’，与各方通融，总算将风波一一平息。”（完颜绍元：《王正廷传》，第325页），这种叙述有为传主讳的色彩，立场过于偏向王正廷，但也可证明最终还是王正廷施加影响，将风波暂时搁置，率团参会。

^③ 完颜绍元：《王正廷传》，第323页。

46年,引者注)在台湾省运动会时指示所决定。”^①然而,当“戡乱”形势急转直下,国民政府军事经济陷入双重困难时,“只管选拔运动员”的慷慨就变成了“应酌派少数人员,作观摩性质之参加”的吝啬。

此外,以后见之明观之,1948年奥运会是中华民国在抗战后成为名义上世界四强之一,又占据大陆这一地理“正统”时期参与的唯一一届奥运会。联合国五大国之一的名分和国内四分五裂的现状之间的矛盾,也参与形塑了体育界人士支持参会的动机。

再从美苏冷战的大环境来看,1947年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标志冷战开始,从时间上而言,紧随而来的1948年的奥运会,显然是冷战开始后的第一届奥运会。苏联本是准备参加1948年奥运会各国中“最为热烈”^②的之一,但最终没有在申请截止期前报名。^③其原因有二:第一自然是与美英的意识形态对立问题,第二则是苏联一旦没有在奥运会中取得优胜,便会被视作对苏联体制影响力和优越性的一次打击。^④“苏联对世运会既表示不参加于前,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又声言退出于后”^⑤,卫星国的退会理由相对直白,直斥“主持国际运动会”的委员会“包括战犯帝国主义之信托公司领袖,代表帝国主义之贵族及法西斯政权在内”^⑥。

有学者因苏联阵营并未参与1948年奥运会,而以苏方参与的第一届奥运会——即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为冷战政治影响下的首届奥运会。但不参加本身也是一种政治行为与对抗行为,并且苏联的缺席让美国在1948年奥运会上所向披靡,并借此彰显自己战后西方世界领头羊的角色。另外,1948年头版的《纽约时报》上,伦敦奥运会开幕式新闻旁边的新闻就是柏林危机的恶化。由此观之,尽管没有在同一片赛场上较量,美苏的博弈和对抗已然渗透到了1948年奥运会,这届奥运会与冷战难以分割,理应被视作美苏两大阵营逐步把奥运会作为冷战对抗舞台这一漫长过程的开始。^⑦

综合上述两种背景,可以推断:王正廷等竭力让中国代表团出现在奥运赛场上的动机,应当从三个方面考察。首先是促进体育事业本身,其次是维护国民党所谓的“宪政”、“建国”等事业,最后是将奥运看作国际交往之良机,借此平台取得外交层面的成果。

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是参与1948年奥运会最明显、最直接的动机。中国体育界对本国运动员的实力心知肚明,除楼文敖外^⑧,基本没有在其他选手身上寄托得分希望。王正廷率团抵英后直言:“我国出席世运代表队对于获得锦标与否,并不太感兴趣,实欲观摩其他国家之运动道德,研究其他国家体育界之进步技术及组织。”王氏还提及参加奥运有助于“训

^① 祯:《文化教育:国庆举行全运会,世运会我决参加:并拟派遣体育考察团》,《国民教育辅导月刊(镇江)》1947年第1卷第2期,第23页。

^② 王微君:《从世运谈到全运》,《申报》1947年3月19日,第5版。

^③ 《苏联不参加世运》,《申报》1948年6月17日,第3版。

^④ See Dennis C. Coates, "Weaponization of Sports: The Battle for World Influence through Sporting Success," *The Independent Review*, Vol. 22, No. 2(Fall 2017), pp. 218-219.

^⑤ 《关于世界运动会》,《浙赣路讯》1948年第337期,第4页。

^⑥ 《罗马尼亚攻击世运》,《申报》1948年8月6日,第7版。

^⑦ See Peter J. Beck, "Britain and the Olympic Games: London 1908, 1948, 2012," *Journal of Sports History*, Vol. 39, No.1 (Spring 2012), p. 29.

^⑧ 对楼文敖为中国得分的期待,参见东南日报体育版编:《伦敦世运前夕》,第63页。Also see Tom Masterson, "Foreign Olympic Hopes Chinese Look to Break Jinx." *AP News features*, 7 July 1948.

练较佳之体育指导员及建筑更多运动场”。^①也有人谈到，即便中国运动员赛场上颗粒无收，归来后若能“促使政府注重国民体育，普遍提倡运动，上下努力，寓增进民族健康于竞技之中”^②就是极好的。概而论之，中国参加1948年奥运会，在体育竞技层面并不追求良好成绩，主要目的是观摩学习、积累经验，以作日后之用、他山之助。

通过参加奥运会团结民心，进而维护政权声誉，最终促进所谓的“统一”、“宪政”、“建国”等事业的想法，与战后体育界普遍把体育和国运、国力挂钩的思想密不可分。王微君将全运、奥运和整个体育事业联系到一起，认为“体育事业关系建国的前途和整个民族的健康至钜”，并表示举办全运、参与奥运的必要性在于“显示胜利后全国各地底统一和平团结的象征，表现于体育活动之中”。^③郝更生将体育实力与“建国”的完成度挂钩：“体育是教育的一部分，教育是建国的基础，我们希望举国同心，埋头苦干，庶能在不久的将来有邀请世界运动会在中国举行的实力，以证明中国建国的完成。”^④郝氏甚至觉得体育可以让民众在实践中学习民主，培养他们忠于国家的精神，从而有助于宪政的实施。^⑤他有关体育和公民法律意识的言论并非个案，王微君也认为奥运会体现的公平竞赛精神很宝贵，可以“藉此培养公法观念”^⑥。

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国内已有一些有识之士注意到奥运会“关系着国际间联系合作邦交”^⑦，赋予奥运会外交层面的重要性。体育人士们还注意将这种具有公开与民间性质的外交尝试同传统外交加以区分，并认为“运动员为彼此谅解之特使，较职业性之和平使者，有过之无不及。”^⑧

综合时人言论，至少有三种外交目标可借参与奥运会而部分实现。首先，因为“我国已因此次胜利踵列四强之林，国际地位已大为增高，一切不能落后，体育亦然”^⑨，也就是说，参加奥运可以体现中国作为大国之一，即便内乱丛生也要参与国际事务的决心。第二，不少人认为奥运会“象征着正义的裁判与一切种族的平等……一切竞赛在同样的机会下公开进行，没有阴谋与掩蔽……这儿有正义，有真理，也是人类真正平等的初步训练。”这种“正义”给了中国这种暂时“资源不富，武力不强”的国家“扬眉吐气机会”^⑩，并借此展现国家形象。第三点也是最贴近奥运会宗旨的一点，自然是借奥运“增进相互之间了解与友谊，从而促进世界的和平”^⑪。

此外，若是结合前述之冷战因素对1948年奥运会的渗透，可以推测出中国与会的又一大外交目标，即借参会表明国民政府倾向西方阵营的立场。当时的舆论界便已有明眼人意识到

① 《王正廷对国内广播 盛赞世运贡献伟大》，《华北日报》1948年7月29日，第3版。

② 义：《七日谈：谈我国参加世运会》，《工商新闻（南京）》1948年第93期，第3页。

③ 王微君：《从世运谈到全运（下）》，《申报》1947年3月20日，第5版。

④ 郝更生：《漫谈全国运动会与世界运动会》，《青荃月刊》1947年第3期，第3页。

⑤ 参见郝更生：《体育与宪政》，《教育通讯（汉口）》1948年复刊4第9期，第20-22页。

⑥ 王微君：《从世运谈到全运（下）》，《申报》1947年3月20日，第5版。

⑦ 王微君：《从世运谈到全运（下）》，《申报》1947年3月20日，第5版。

⑧ 《英国方面声称世运决不停办》，《申报》1947年9月7日，第6版。

⑨ 王微君：《从世运谈到全运（下）》，《申报》1947年3月20日，第5版。

⑩ 张安治：《世运会随感录》，《旅行杂志》1948年第22卷第9期，第1-5页。

⑪ 义：《七日谈：谈我国参加世运会》，《工商新闻（南京）》1948年第93期，第3页。

这一点，并推演了这一参会外交动机背后的逻辑链条：参加奥运会需要“公平竞争”，而“公平竞争是民主政治的教条”，所以不参会的国家就是不明白这一教条的“民主政治以外的国家”。^①事实证明，不参会的是苏联阵营，而中国排除万难也要参会，这就暗示：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华民国是民主政治“以内”的国家，和苏联不同。只要国民政府维持着大陆政权，就不会走向苏联阵营，而会拥抱美英的所谓民主阵营。

四、成功参会的竞技结果与外交收获

虽然奇迹般地出现在了奥运赛场，但代表团的比赛结果却没有发生奇迹，中国选手在参加的各单项中均没有拿到可以获得团体分数的名次，综合当时的媒体报道与之后的统计，可列表 1 以直观地感受中国运动员的成绩。

表 1：1948 年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竞技结果

项目类别	参赛选手 (队伍)	比赛时间	具体赛事	比赛结果	最终名次
篮球	中国男子 篮球队	7 月 30 日	小组循环赛	39:44 负智利	小组第五，进 入 17-23 名排 位赛
		8 月 2 日		36:34 胜比利时	
		8 月 3 日		49:48 胜朝鲜	
		8 月 4 日		32:51 负菲律宾	
		8 月 6 日		125:25 胜伊拉克	
		8 月 9 日	17-23 名排位赛	42:34 胜瑞士	第 18/23 名
		8 月 11 日		54:25 胜英国	
		8 月 12 日		38:54 负意大利	
田径	楼文敖	7 月 30 日	男子 10000 米决赛	32 分 56 秒	第 17/30 名
	黄两正	7 月 30 日	男子 400 米中栏预 赛	57 秒 7，小组出 局	无
	楼文敖	7 月 31 日	男子 5000 米	复赛列小组第 7/ 12 名，未晋级决 赛	无
	陈英郎	8 月 4 日	男子 400 米预赛	50 秒 7，小组第 3/6 名，出局	无
	楼文敖	8 月 7 日	男子马拉松决赛	未能跑完全程	无
游泳	吴传玉	7 月 30 日	男子 100 米自由泳 预赛	63 秒，小组出局	无

^① 《关于世界运动会》，《浙赣路讯》1948 年第 337 期，第 4 页。

足球	中国男子足球队	8 月 2 日	淘汰赛第一场	0:4 负土耳其，首轮即告出局	第 14/18 名
自行车	何浩华	8 月 7 日	男子 1000 米竞速赛预赛	负于比利时选手并堕车受伤，因伤退出其后所有赛事	无

资料来源：《申报》1948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15 日，第 7 版相关报道；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体育史学会编：《中国近代体育史》，第 263 页；裘争平：《1948 年伦敦奥运会上的中国足球队》，第 43 页。

说明：男篮小组赛五轮战罢，与菲律宾、智利、朝鲜、比利时同为三胜两负，因五队均战胜伊拉克，故比较五队间的“平均得失分”（总得分乘 100 除以总失分）时需忽略对伊拉克的净胜分，中国队的“平均得失分”因此为五队垫底，只得屈居小组第五，参加 17-23 名排位赛。

全军覆没的成绩自然难免招来嘲讽，英国《镜报》甚至以漫画讽刺中国代表团参加的三届奥运会，总计一分未得，全部“吞蛋”^①。而当中国代表团在奥运会尴尬“吞蛋”的同时，恰逢日本游泳选手打破两项游泳世界纪录^②，国内舆论多有借此两相对比以挖苦者。

除了赛场失意，代表团的回国经费也成了问题，足球队再次通过绕道比赛的方式募集经费，经菲律宾与泰国返回香港，篮球队也自行回国。^③无法效仿足球队筹款方式的代表团剩余成员的回国问题，让王正廷大费周章，在政府不肯追加拨款的情况下，王氏最终靠向孔祥熙和诸多在英华侨劝募，加以“自掏腰包”，才将团员送回国内。^④

不过，若抛弃“唯成绩论”，将中国的成功参会视为一次公共外交尝试，则中国代表团便显得活跃了许多。以一次公共外交尝试观之，中国代表团参加 1948 年奥运会的最大价值与收获便在于“表现出国家通过体育继续参与世界事务的决心”^⑤，代表团一切国际交往行动的目的与成果皆紧紧围绕于此。

首先，积分榜上颗粒无收的中国运动员在竞技场上并非一无所获。万米比赛中，楼文敖血染跑鞋，但是他依然坚持到了终点线，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欢呼，楼的事迹甚至“传遍了全球”。^⑥足球队虽负于土耳其，但对方是著名劲旅，在和强队过招的过程中，球员们“获益良多，尤在射球方面更甚”。^⑦而篮球队仅因小分遗憾出局，战胜的对手中还不乏进入前八的朝鲜，此外大胜伊拉克队 100 分，也创造了当届奥运的最大分差，自然赢得了喝彩。^⑧

^① 王正廷：《顾往观来：王正廷自传》，柯龙飞、刘昱译，宁波：宁波国际友好联络会，第 212 页。
^② 《我出席世运代表已无获分希望 日本选手创游泳新纪录》，《平民日报》1948 年 8 月 10 日，第 4 版。
^③ 《我世运足球队离英乘机返国》，《申报》1948 年 8 月 13 日，第 7 版。
^④ 参见董守义：《奥林匹克与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编：《奥运会与中国》，第 36 页。
^⑤ 徐国琦：《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第 55 页。
^⑥ 参见王正廷：《顾往观来：王正廷自传》，第 211 页；《楼文敖万米赛屈居第十七名》，《申报》1948 年 8 月 1 日，第 7 版。关于楼氏脚部出血的原因有两种说法，《王正廷自传》称是因为楼的钉鞋质量不过关，铁定穿透鞋底导致出血，而《申报》等报纸也有楼氏脚上血泡磨破导致出血的说法。
^⑦ 《我世运足球队离英乘机返国》，《申报》1948 年 8 月 13 日，第 7 版。
^⑧ 《世运篮球最高纪录 我胜伊拉克一百分》，《申报》1948 年 8 月 7 日，第 7 版。

除了在比赛中赢得尊重,代表团也很注重在形象方面给外人留下良好印象。代表团的负责人们已意识到:团员的形象便是国家的形象,因而团员手册规定,在伦敦的代表团成员“服装应力求整洁,以免有玷国体……除在宿舍或特殊处所时,所有团员,均须穿着规定之制服,以壮观瞻,藉资识别。”^①在大会开幕式上,代表团身着统一的蓝上衣白长裤,以“高大壮硕身长六英尺三寸”的篮球队员黄天锡为旗手入场。选拔旗手也是选择国家的名片,1948年奥运会可谓开创了新中国多以篮球运动员为奥运旗手的先例。而董守义则在开幕式中同国际奥委会委员并肩立于皇家看台之前,^②可谓象征着风雨飘摇的中华民国仍力图在体育为代表的国际事务中占有一席之地。

另外,中国借参加奥运之方便,派代表团成员董守义、江良规参加了奥运前夕(7月23日至7月26日)在伦敦举办的体育、娱乐与体健会议。^③江良规还在大会结束后赴美参加中美教育家的体育工作会议。^④这些会议同绝大多数中国在战后参加的国际会议一样,不可能解决国民政府在军备、财政上的燃眉之急,但只要不断参加,也能起到积少成多之效,体现着中国全方位加强国际社会参与度的决心。

再者,一些代表团成员借参会之便,同外国同一领域的人士会面,巩固私人关系的同时,也推动这一领域的后续发展。郝更生曾经在奥运会期间接洽印度和菲律宾的体育官员,讨论恢复因大战中断的“远东运动会”,并建立首个亚洲国家间的体育组织,今天的亚运会便由此肇始。^⑤除了随团人员,陈立夫也出席了奥运会开幕式,顺便礼节性地问候了自己在英的友人,并了解了一些工党的组织管理和国有化工业的情况。^⑥

而最重要的是,王正廷等抓住机会,以在英华侨和英商为重点,在各大社交场合增进了中外友谊。8月3日晚,中国代表们一同参加了英王夫妇在白金汉宫举行的招待会。^⑦8月9日,王正廷夫妇参加了中央社餐会,8月10日,二人赴华侨商会招待午宴,当晚又在大使馆设宴回请。8月11日的《泰晤士报》直接以“英国对中国的友谊”为题刊载了王正廷在10日午宴上与英国商务人士会面的情形。王正廷在午宴上的简短演说中表示:中英两国人民的经历有着许多相似性——都遭受过巨大的困难但最终化险为夷。两国人民也有极相似之个性,即俱能忍受各种劳苦,并克服一切困难。两国应自体育上及商业上之联系,进而沟通中西两大文化,使彼此互相了解,互相合作。英国方面,参会的蒂维厄特(Teviot)爵士认为中英之间除了有着共同的贸易利益,也有着深厚的友谊和好感,在不远的未来有着良好的机会增进友谊。英联邦关系大臣诺埃尔-巴克(Noel-Baker)则宣称他被奥运会的作用所折服了,最近几周运动员们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相信体育运动员们也许能比政客为世界带来更好

^①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干事部编:《第十四届世界运动会中华代表团手册》,第9页。

^② 《世运大会开幕盛典我代表团雄姿英发 容启兆宋君复领导黄天锡持旗》,《申报》1948年7月31日,第7版。

^③ 《国际会议(十三)》,1948年2、3月,外交部档案,台北“国史馆”藏,数位典藏号 020-080403-0038。

^④ 《我世运代表团下周离英返国》,《申报》1948年8月8日,第7版。

^⑤ 参见郝更生:《郝更生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第37-39页。

^⑥ Foreign Office to Chinese Ambassador Nanking, London, September 9 1948, FO 371/69537.

^⑦ 《英王招待世运选手》,《申报》1948年8月5日,第7版。

的东西。^①而在英华侨除了前述的在代表团回程资金缺乏的情况下施以援手，也为中国排除万难参与奥运感到兴奋不已，华侨们也捕捉到了中国派团参会真正重大的意义：“此次虽未能载誉而归然已给予外人留下一良好之印象。且此次由观摩研究所得之经验，已足以为他日促进我国运动之张本。”^②

五、余论：在体育史之外发现体育事件

诚然，由于中国运动员在积分榜毕竟尴尬“吞蛋”，国民党政权又早已积重难返，更兼战后英国在中国的势力大幅衰退，沦为美国的“沉默的伙伴”^③，第四部分中所述的几类外交行动的最终成果都是极为有限的。

本文亦无意过分强调中国参与1948年奥运会在政治与外交层面的意义。尽管体育界人士大有借参加奥运会以匹配战后四强之一的国际地位的想法，但艰窘异常的参会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闹剧与丑闻，实则也是国民党政权合法性不断流失的明证。而在不少的事后反思者看来，中国运动员在奥运赛场的失败，根源正是国家的穷困、官员的腐败。如此一来，虽然力图维护政府声誉的力促参会者们能够模糊地认识到“当强国普遍依靠非外交方式时，弱国会特别注重外交，因为这也许是促进或保护其国家利益的唯一手段”^④，也因弱国现实的倒逼而以参加奥运作为争民心的尝试，但这反而成了自揭短处，将大国梦幻与弱国实际的鸿沟又一次摆在了世人的眼前，最终收到了丢民心的苦果。

本文的一大目标，实际在于展示一种研判现当代中国参与奥运会等国际体育事件的动机与价值的新视角。由此出发，或可进一步触及更为宏观、重大的命题：中国如何逐步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事务。这种新视角的关键在于：认识到国际性体育赛事是内政的延伸、外交的舞台、文化的秀场、博弈的棋局，而在这一点上，西方学界目前走在前头。^⑤

^① See "Britain's Friendship For China." *Times*, 11 Aug. 1948; 也参见《代表团酬酢忙 英航招待天空游览》，《申报》1948年8月12日，第7版。关于华侨商会招待的午宴，《泰晤士报》的记载是10日召开，主办方是“Anglo-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与中方报纸所称的“华侨商会”应为同一机构。而《申报》的同一条新闻中分别援引伦敦11日广播和中央社10日电，前者称王正廷夫妇11日参加华侨商会招待会，后者称二人10日中午参加华侨商会招待会，10日晚在大使馆回请。由于10日、11日连续参加同样的华侨商会招待会不合常理，且所谓伦敦11日广播所载王正廷在招待会上的讲话与《泰晤士报》记载的内容几乎相同，因而可以推断王正廷只是在10日中午出席了华侨招待会并发表讲话，伦敦11日广播的内容其实是11日之前一天，即10日的消息。而在1948年奥运会的报道过程中，《申报》引述的伦敦广播的内容也多有这类滞后一天的现象。

^② 《古老的伦敦气象一新 中国选手团精神饱满》，《申报》1948年8月10日，第7版。

^③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FRUS) 1948 vol. III Western Europe*,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4, p.1101.

^④ 徐国琦：《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马建标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5页。

^⑤ 除了徐国琦以中国的国际化为线索考察中国同奥运会百年联系的大作：《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之外，还有将奥运会与世界杯的政治、文化价值进行比较研究的 Alan Tomlinson and Christopher Young eds., *National Identity and Global Sport Events: Culture, Politics and Spectacle in the Olympics and the Football World Cup*,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6. 将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视作冷战对抗一部分并加以深度阐释的 Philip D'Agati, *The Cold War and the 1984 Olympic Games: A Soviet-American Surrogate Wa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在国内学界，就笔者所见，有清晰的挖掘体育事件背后政治、外交、文化意涵之意识的，值得注意的作品是陈明辉：《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与近代社会体育事业（1924-1949）》，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7年，该文用一章的篇幅探讨了“中华体协与体育的国际交往”。

笔者在本文中尝试挖掘了中国参与 1948 年奥运会背后的政治潜流,在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探讨中国的参会动机与意义,并选择了“公共外交”的概念来审视中国坚持参与 1948 年奥运会的行为及其出现在奥运赛场的价值与收获。要被定义为“公共外交”行为,需要满足行为对象是公众不是对方政府,行为主体是官方或经官方授权,行为方式是公开的平等交流而不含政治强压等要求,而行为目的则主要在于提高本国美誉度,增加国际社会对本国的认同。^①

中国代表团在伦敦的国际交往行为主要对象是在英华侨、英国商界,并非掌管军国大政的政府要员;代表团虽然没有得到政府的太多资助,但毕竟经过政府授旗^②,又是由与官方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王正廷、董守义、郝更生等带领的;而代表团所有的行动显然是公开透明的。由此观之,中国代表团在伦敦的行动契合公共外交的特点,可以从公共外交的角度加以阐释。而且,如前文所示,奥运会带来的国际交往机会已被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王正廷等更没有忽略,代表团手册中的“团员须知”第一条就包括了“普遍建立国际友谊”^③的内容,所以,代表团在伦敦的公共外交行为应被视为自觉的而非他指的。此外,相比于“民间外交”和“体育外交”的概念,既体现政治色彩、又不是政治挂帅的“公共外交”,相对而言更适合形容 1948 年奥运会中的外交行为。

当然,“公共外交”绝非唯一合理的概念,徐国琦钟爱的“国际化”与“共有的”(shared)的说法亦令人信服,王正廷在 8 月 10 日的午餐会上,提及了中英两国经历的共通之处和中英国民性格的相似之处,这种不经意的实践恰与徐氏倡导的“共有的历史”相契合,体现了徐氏所说的“体育运动还了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共有经验,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参照点。”^④另外,国外学人多次使用过的“认同”(identity)概念亦是颇具启发性且值得参考、借用的理论。当然,不论是哪一种理论,都需要进一步的甄别和本土化,以免生搬硬套所带来的削足适履和千人一面之讥。而追求新颖的视角和概念也断然不能替代对史实本身严谨、扎实的考证与叙述,毕竟“历史著作的最基本功能是叙事,议论风生虽可见历史家的智慧,但毕竟已出历史之外。而对历史真实生动且准确地描述又是史学之树常青的一股活水”^⑤。

参考文献

- [1] 爱如生典海——《申报》数据库, http://dh.ersjk.com/jsp/front/prodlist_jd.jsp。
- [2] 除《申报》外中文报刊查询自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 <https://www.cnbkcsy.com>。

^① “公共外交”的定义与特点,参见高飞:《公共外交的界定、形成条件及其作用》,《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5 年第 3 期,第 105-106 页;赵可金:《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年,第 13-19 页。

^② 1948 年 6 月 23 日,总统府秘书长吴鼎昌代表总统向奥运会代表团授旗,参见山僧:《第十四届世运会:苏联等国不参加》,《世界月刊(上海 1946)》1948 年第 3 卷第 1 期,第 22 页。

^③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干事部编:《第十四届世界运动会中华代表团手册》,第 9 页。

^④ 徐国琦:《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第 42 页。

^⑤ 茅海建:《不同的声音——读〈中间地带的革命〉》,《近代史研究》1995 年第 1 期,第 288 页。

- [3] 行政院档案, 外交部档案, 台北“国史馆”藏, <https://ahonline.dnrc.gov.tw/index.php?act=Archive>。
- [4] 外文报纸查询自 Gale Primary Sources 检索平台, <https://galeapps.gale.com>。
- [5] SAGE 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 中国 1919-1980, http://www.archivesdirect.amdigital.co.uk/FO_China。
- [6] 东南日报体育版编:《伦敦世运前夕》, 上海: 东南日报社, 1948 年。
- [7] 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编:《中国近代体育文选——体育史料 第 17 辑》,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2 年。
- [8] 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体育史学会编:《中国近代体育史》, 北京: 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 1989 年。
- [9] 郝更生:《郝更生回忆录》, 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69 年。
- [10] 体育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编:《体育史料》第 1 辑,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80 年。
- [11] 文史资料出版社编:《奥运会与中国》, 北京: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5 年。
- [12] 完颜绍元:《王正廷传》,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 [13] 徐国琦:《奥林匹克之梦: 中国与体育, 1895-2008》, 崔肇钰译,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9 年。
- [14] 徐国琦:《中国与大战: 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 马建标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 年。
- [15]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干事部编:《第十四届世界运动会中华代表团手册》, 南京: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干事部, 1948 年。
- [16] 赵可金:《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 年。
- [17] 高飞:《公共外交的界定、形成条件及其作用》,《外交评论(外交学院院报)》2005 年第 3 期, 第 105-112 页。
- [18] 华晨栖:《旧中国申办奥运会的一场风波》,《体育文史》1992 年第 3 期, 第 67-68 页。
- [19] 金玉良:《第 14 届奥运会与中国代表团》,《体育文史》1994 年第 1 期, 第 45-47 页。
- [20] 茅海建:《不同的声音——读〈中间地带的革命〉》,《近代史研究》1995 年第 1 期, 第 281-289 页。
- [21] 裘争平:《1948 年伦敦奥运会上的中国足球队》,《档案春秋》2006 年第 10 期, 第 41-43 页。
- [2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FRUS) 1948 vol. III Western Europe*,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4.
- [23] Dennis C. Coates, “Weaponization of Sports: The Battle for World Influence thro

ugh Sporting Success,” *The Independent Review*, Vol. 22, No. 2(Fall 2017), pp. 218-219.

- [24] Peter J. Beck, “Britain and the Olympic Games: London 1908, 1948, 2012,” *Journal of Sports History*, Vol. 39, No.1 (Spring 2012), p. 29.

“I can’t believe we got involved”: China and the 1948 Olympics

Xu Junzheng

Junior year, Nanjing University, 210023

Mentor: Sun Yang

Associate professor, Nanjing University, 210023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preparing for participation in the 1948 London Olympics, Chinese sportsmen, represented by Wang Zhengting and Dong Shouyi, overcame financial and personnel difficulties and successfully organized a Chinese deleg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Games amidst internal factional strife and serious corruption. Combining the civil war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Cold Wa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Wang Zhengting and others were motivated by at least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sports development, government prestige and public diplomacy in their efforts to get the Chinese delegation to appear at the Olympic Games. Although the Chinese delegation did not score a point in the end, the fact that Chinese athletes were present at the Olympic Games demonstrated China's determination to continue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Wang Zhengting and others made a conscious effort 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engage in some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1948 Olympic Games was a successful attempt at public diplomacy, which also showed that it might be possible to transcend the traditional history of sport and to review the value of sporting events from a new perspective.

Key Words the 1948 Olympics; Wang Zhengting; Dong Shouyi; public diplomacy